

赵光贤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亡尤室文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

赵光贤卷

亡尤室文存

赵光贤 著

北京出版社

2001.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亡尤室文存/赵光贤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9
ISBN 7-303-05681-5

I. 亡… II. 赵…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文集
IV. K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451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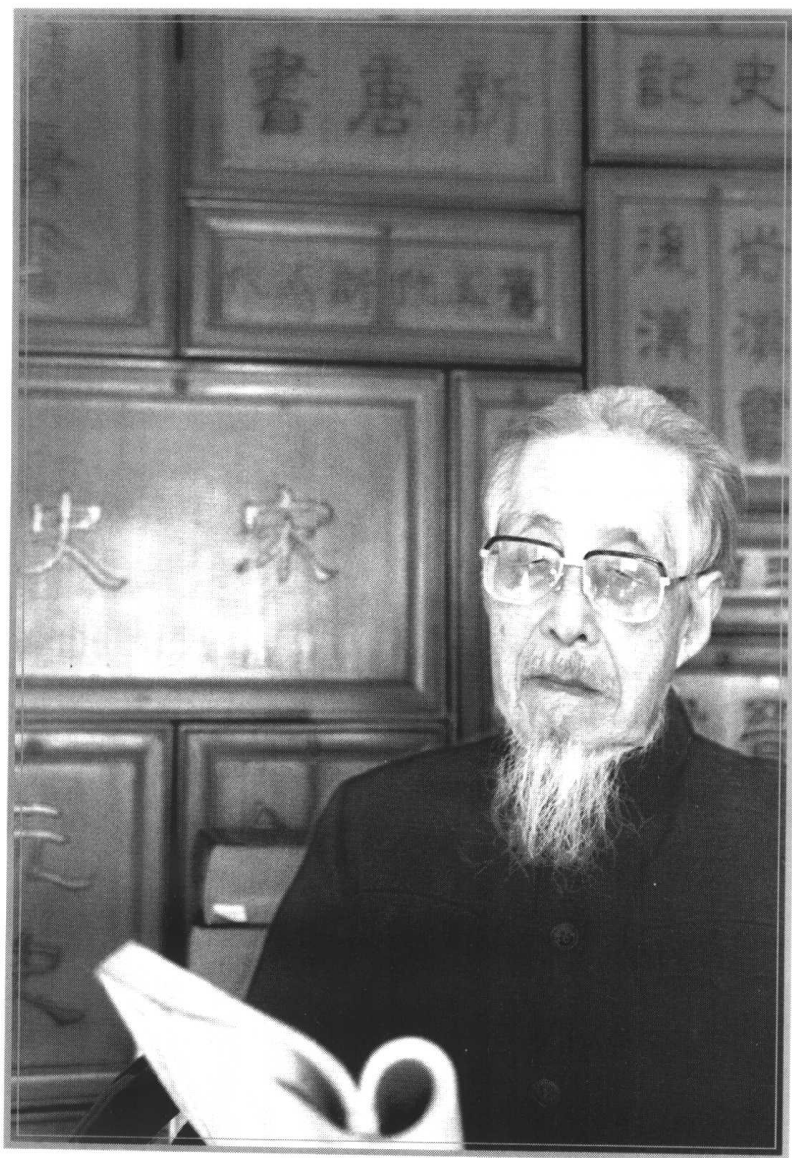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21.5 字数:618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定价:35.00 元



作者像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黄祖洽

副主任委员 郑师渠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炳照 孙儒泳 刘伯里

陈文博 陆善镇 何香涛

何克抗 张新时 杨展如

郑师渠 林崇德 袁贵仁

顾明远 郭志刚 常汝吉

黄祖洽

总 序

为迎接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展示著名专家教授的学术成就，校出版社拟出版一套《教授文库》，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对继承学校的优良传统，纪念艰难创业的先辈，记录教授教学、科研的成果，给学生提供治学、作人的启示，以及推进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都有相当的益处。

北京师范大学已经历了百年沧桑。从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始，直到经过了风风雨雨、面临着21世纪的新北京师范大学，若干代的北师大人，包括教师和学生，纷纷走在时代浪潮的前列。他们或直接投身革命，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或献身教育和科学，为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和国家总体实力而努力拼搏，对国家、对人民，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百年来，曾经或正在从教于北师大教授中，有不少知名的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和作家。他们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潜心治学、淡泊名利、教书育人。他们的精神风貌、节操志向、道德文章、学术思想、研究成果，以及优良的治学方法、高尚的处世原则，都无愧于北师大校训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八个字，的确令人饮敬。他们的诗文著作和讲学文稿，

真实地记录了所取得的卓巨成就和可贵的人文品质，理所当然应为《教授文库》收编的首选。鉴于文库卷帙有限，不足以收揽全部，主要收入未经公开发表过的作品。有的著作因发行年代久远，现已绝版，而内容仍历久弥新，有学习参考的价值；有的著作出版多年后，作者又有新意，需补充新的材料，也应重新付梓，以满足读者的需要。此二类作品同属入库之佳选。

近年来，学校领导锐意改革，大力延揽人才。教授中的中、青年才俊已渐增多。他们学有专攻，才擅独创，呼应当前时代的脉搏，同领科教学术的风骚。其杰出著作亦应逐年收入《教授文库》，以飨同好。行见本文库随着北师大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编帙日益丰富，内容日见精彩，将能推陈出新，跟上时代的步伐，迈入优秀学术著作的丛林。这正是我们对文库出版所寄予的厚望！

《教授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0年11月

我的自述

——学史贵有心得

一 我学习和研究历史走了非常大的弯路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玉田县，1910年2月24日生于江苏省奉贤县（现归上海市，那时我的父亲在那里做县长，因而取名光贤，字奉生）1916年返回老家，请了一位秀才教兄姐和我，读《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古文观止》《千家诗》《论语》等。老师的教法就是叫我死记硬背，像《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阿房宫赋》《赤壁赋》《醉翁亭记》这样的长篇都能背得下来，至于懂得多少，老师就不管了。这种教书方法，现在想来，觉得很不科学。或许是由于秀才先生学问有限，或许是他认为我年纪小，讲解了也不懂。这样读了三年，家里觉得各地普遍设立洋学堂，再读私塾，就落伍了，于是把我送到县立小学，读高小，那是1919年。一年级教国文的老师是一位老秀才，二、三年级的老师是一位老举人，由于我读过私塾，读新编的国文教本并不感到困难，并且开始作文言文。这时已到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的风并未吹到我们的小学，所以一直读文言文。到二年级开始读英文。在小学三年里，我最喜欢的、成绩最好的课是历史和地理，最差的是数学。这时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日本强占胶州岛和青岛，五四运动、俄国革命等大事，历史老师对我们都讲过，给我们

这些小学生的影响还是不小的。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以后所走的路，一条弯而又弯的路在这里就定下了！

我自幼就对历史有兴趣，自幼就赶上了中国传统史学面临严重挑战的时期。1921年，我见到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当即买了一本研读。虽然对于此书的内容当时未全部掌握，但是对它仍然感到极大的兴趣，有一股求学的激情在心中荡漾。梁先生在此书中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对于历史事件的考证，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对他十分敬佩。回头看来，20年代史学界出现的一股强烈的疑古思潮，对青年时代的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5年，我毕业于河北省立第四中学，地址在卢龙县，清代的永平府，古代属孤竹国。这期间，我对学习历史的兴趣就更大了。先是津津有味地读着梁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尽管书中讲的古书有很多我未读过，通过此书，我对未曾读过的古书有了一种新鲜感。接着，顾颉刚先生主持的《古史辨》第1册出版了，我又买来读。他那篇很长的自序，讲他在北京大学学习古史的经历和心得，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读完后，我在序后写了几百字的读后感，说这篇序“是我读到的一位真正的学者的真实自述”，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认为顾先生是我学习的榜样。对我影响更大的，是第一次读到陈垣先生的文章。那是在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9期上，陈先生写了篇《书内学院校慈恩传后》。在这篇文章里，他批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考证关于唐僧玄奘法师西游时出发年月的错误，使我很吃惊。其时，我认为梁先生可以算得上历史学界的泰山北斗，没有想到有人能驳倒他。从这时起，我认识到研究历史离不开考证，并且开始接触到搞考证的方法，这对我后来研究历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年暑假，我来北京考大学预科。首先考北京大学，由于我的数学水平太差没有被录取。那时北大录取学生的要求甚严，必须每门都及格。即使其他功课再好，而有一门不及格，也不能被录取。当时法政大学预科也在招生，我去报名，要在法律、政治、经济三系中选一个，这使我很为难，因为我对三系都没有兴趣。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选定了政治系。法政大学预科录取的重点是国文，数学也考，但非常

容易。我被录取了。当时的预科二年，相当于高中二、三年级，但课程则大不相同。除了读古文之外，大部分时间读英语和第二外语德文或法文，每周 18 小时。此外，有逻辑学、伦理学、法学通论，等等。都是有名的教授来教课。这在今天的高中里是见不到的。

在法政大学预科读了二年，又读了一年本科。这时是 1928 年，当时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国民党势力很快达到北京（改名北平），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他上任之后，第二次招新生和插班生，我去报名二年级，希望转到历史系。被录取后，请求转系，不许，只好仍在政治系。政治系的必修课不能不学，读英文书多，没有时间读中国史书，就于课余读西洋史。图书馆里英文书很多，我等于一面学历史，一面学英文。

1932 年大学毕业，不久就病倒了。此时正当“九·一八”事件之后，东北四省都被日寇占领，怕日军进关，我家搬到北京来。1934 年冬，我身体复原，恰好天津《大公报》到北京招考编辑，我想做新闻记者也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应考者有百余人，结果录取四人，我是其中之一。《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先生亲自口试。当时《大公报》在北方很有名，社论更为大家所爱读，能在张先生手下当一名小卒也感到高兴。

从 1935—1937 年春，在《大公报》干了整两年的助理编辑，编国际新闻。原来想终身干新闻事业，但好景不长，日寇进逼平津，华北危在旦夕。《大公报》见势不妙，准备南迁，在上海设立分馆，出上海版的《大公报》，经理胡政之让我到上海去。听先到上海去的同人说，上海馆址临大街，地方狭小，吵闹不堪，我本来就睡眠不好，此时又患肠胃病，怕去上海病情加重，没有去。我辞职回到北平后经人介绍，在师大毕业同学办的中华中学教国文。1938 年新学年开始，辅仁大学陈垣校长办的史学研究所招生，在报纸上看到招生广告，见到陈垣的名字，立即回忆起往事，认为这是大好机会，立即报名，被录取了。于是我在绕了一个大弯子之后，终于回到学习历史的道路上，实现了初衷，而且在多年仰慕的名师指导下学习，在我一生中，是一次决定性的转折。

在辅仁大学的几年中从陈老师学到什么东西呢？总的说，学到研究历史的方法。如何搜集、鉴别、分等、使用史料，如何利用这种史料做考证工作，以及做考证的必要性等等。这些优良的史学传统，至今也是行之有效的。

回忆往事，我常常说自己学习和研究历史走了非常大的弯路。我从幼小的年岁时起，就对历史和地理有强烈的兴趣，可是，自从1925年上法政大学预科到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修的却不是历史；1938年，我到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师从陈垣先生，学习的是明清史；1940年毕业后，在辅仁大学却教了七年西洋史；1949年，又因工作需要而改教先秦史，以迄于今。

二 从攻明清史到治先秦史

我在做研究生期间，把从陈老师那里学来的治学方法主要用在明清史研究上，写出了一些论文，后来收入《古史考辨》文集中。同时，也把这种方法运用于考察当时的上古史研究上。1939年，顾颉刚标点的《崔东壁遗书》出版，我对此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受了不小影响。我发现，顾先生标点《崔东壁遗书》及其研究中，继承和发扬了崔述的疑古与考信的传统。如果说，崔氏的考信还不免有对儒家经典“六艺”的迷信，那末，顾氏则连这一点迷信也破除了。同时，我又发现顾先生还受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影响，过分夸大刘歆作伪的能力，属于疑古过当，难免为白圭之玷。我之所以对顾先生受康氏的影响持否定的态度，这与受陈老师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陈先生反复强调不轻信也不妄疑。我在读书研究中是牢记住的。

1940年夏，我从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毕业了，本想重点学习明清史，计划从明末清初努尔哈赤搞起，做梦也没有想到搞起先秦史来。毕业后留校，教务长荷兰人胡鲁士要我教历史系的西洋上古史和外语系的世界史。这些课原来都是由外国人教，课本也是英文的，此时中学里都不学英文，改学日文，所以新生入学听外国人讲课非常困难，于是学校决定要我代替外国人教课。1947年夏，系主任张星烺先生忽然

中风瘫痪，他教的先秦史无人代替。陈老校长找到我，要我来教，说你教过西洋上古史，再教教中国古代史吧。我对先秦史没有下过工夫，怎能上台，一再坚辞，直到快开学了，老校长又来对我说，找不到人，只好请你勉为其难了。我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来教。我看张先生的讲义第一章伏羲、神农、黄帝。我觉得这只是传说，不能算是历史，于是大胆改革，从中国猿人教起，又介绍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同学们觉得耳目一新，没有对我这现趸现卖的教师表示不满。到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的历史系整个归入师大，我仍教先秦史，一直到今天。可见人世间的不是能由主观愿望决定的。院系调整前我被聘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此时我知道我必须走研究先秦史这条路了，只好边学边教。首先要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40年代后期，即我开始在辅仁教先秦史时，读过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吕振羽的《殷周时期的中国社会》，但在解放后才读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并认识了翦伯赞先生。这样对用马克思主义来讲中国史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贯穿到教学中去。其次是认真学习中国的古典著作、甲骨和金文。开始读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他对先秦古史的研究，也用考证方法，凡有论证总是有根有据，非常深入，我仿佛又遇到一位大师，他作的《生霸死霸考》《殷周制度论》《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等名篇，对我都有强大的吸引力，一读再读，余味无穷。我从其中开始学到用考证方法来研究古史的门径。

还应当提到，顾颉刚编的《古史辨》七册，在解放前我都买来读过。此书是各家辩论古史古书的文章的总集，我主要读顾先生的文章，他的文章的中心在疑古和辨伪，被人称为疑古派。他又编订《崔东壁遗书》，把崔述和他的弟弟崔迈等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收齐（由亚东图书馆印行），前有胡适作的长序《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序的下部是老友赵贞信先生作的。此书近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删去一些次要的文章）。崔述的著作主要是一部《考信录》，是清人论述古史的杰作，是顾颉刚疑古思想的重要的来源之一，是研究古史的必读书。这部书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由于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搅在一起，真史

和伪史很难辨别，崔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可惜后来研究古史的人不读崔书，有些崔氏已经驳倒的谬说，直到今天还在流行，真是憾事。如果说顾颉刚是疑古派的领袖，那末崔述应当说是祖师。

有人问我：“你是陈垣先生的学生，可是陈先生不搞先秦史，你是怎样搞先秦史的呢？”我说：陈先生虽不搞先秦史，但从他学会了如何搞考证，这个方法在研究任何历史都是必要的，这是基本功。在先秦史方面，崔述、王国维、顾颉刚都是我的老师。王国维教我怎样把考证方法应用到古史研究中去，崔述和顾颉刚教我如何分辨真史和伪史、真书和伪书，这都是研究古史的必要的本领。还应当提到郭沫若。他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他的著作很多，但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为最重要，《卜辞通纂》次之，都是不朽之作。《大系》是金文研究中划时代的著作，他是第一个把金文按时代顺序排列，是历史的研究法，同时又把铜器的图像、铭文拓本、今译和考释编在一起，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巨著，特别是他写的考释最见功力，是后人不易追步的。我同时学习诸位大师的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诸位大师各有所长，也有所短，取长补短，互相补充，含英咀华，他们的著作都是最好的营养。我在北师大至今 38 年，除了 10 年动乱之外，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和研究上了。

过去的学者绝大多数是在书本上下工夫的，我认为这很不够，特别在先秦史方面，由于留下来的古书不多，不够用，必须另辟蹊径，那就是学习考古学和民族学。关于后者，由于我没有机会到兄弟民族地区去调查研究，就不谈了。关于考古学，我特别注意，记得在 1956 年开过一个学期的考古学课。我教先秦史是一年级的课，每年都带学生到周口店猿人遗址去参观，一次遇到亲手挖出猿人头骨的老工人刘同志，他给我们讲如何发现、掘出猿人头骨的经过，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还有一次遇到主持开掘周口店猿人洞的裴文中先生。他是我的老乡先辈，又是研究古人类的专家，他给我们讲北京猿人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等于给我们上了一堂人类学史的课。以后我不教课了，有时也带学生去参观周口店、芦沟桥。1979 年以来，每年都带着研究生到安阳、郑州、洛阳、西安、周原、宝鸡、太原等地参观。我对学生

说：考古工作者是站在第一线，古文字学家和古器物学家站在第二线，历史学者站在第三线，没有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研究先秦史就很难办了。因此，研究古史不能没有考古学的知识。60年代末，北师大在山西临汾建立分校，我在1971年春到临汾，在从临汾县城到分校的路上有一名高堆的村庄，中有一大洼地，附近路上都是红陶片，老乡说还出土不少各式各样的陶器、石器，带有各种花纹，他们说的很清楚，知道这是一个自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可惜全被破坏，只见两个石犁头，比在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的还大。我对学生们说，以后你们到什么地方工作，一定要宣传保护古文物，给人们讲解如何识别古文物，这是我们学历史的人的责任。总之，学历史的必须有考古知识，否则免不了学识浅陋。学考古的也必须有历史知识，否则免不了牵强附会，贻讥通人。

新中国建立以后，几乎所有史学工作者和教师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希冀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历史的一切现象。我也追随大家之后，但我感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除了少数人老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之外，多数人都是初学，因而在讲课、写论文中，有的难免出现生搬硬套的现象。这种缺点，我在80年代给研究生讲课时毫无保留地讲给他们听，希望他们不要重蹈覆辙。我的话都写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

以上就是我边教边学先秦史的过程。我从王国维那里学到利用古文献与地下出土材料做考证工作；从崔述和顾颉刚那里学到不轻信古书和辨伪的门径；从郭沫若的著作中开始学习甲骨文和金文；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

一个人在事业的追求中，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问题。这怎么讲？我选择从事中国史研究，乃至先秦史研究，有很大成份的偶然性因素；但要把它作为事业来做，干出成绩来，就要勤奋，持恒了，这就是必然性的因素。一个人遇到偶然性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把必然性的因素贯注到偶然性中，这是一种功夫，一种追求，一种境界。这是我回忆往事所产生的一个深刻体会。

三 我从陈垣师那里学到了什么

时间流逝飞快，回忆半个多世纪前，当我列入先师门墙时，还是一个青年，今则蹒跚老翁，而学业成就微不足道，我现在才体会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真正意义。

1938年秋，我考入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在先师的教诲奖掖下，走上学习史学的道路，至今已逾55个春秋。先师于1971年辞世，至今已过20年了。缅怀先师在励耘书屋里谈治学经验，历历如在目前。真不胜今昔之感。

我在20年代读过先师的考史文章，仰慕已久，没料到能亲受教于先师，实现我学习史学的夙愿，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先师为研究生开了一门课，名“清代史学考证法”，以《日知录》为教本。他不讲书，要学生自己读，要求学生去寻找书中所论述的每一条史事或议论的出处，并写出笔记。先师亲自看学生的笔记，并在课堂上指出某处对，某处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何在？学生都不懂如何运用史料，并不只是读书，而是用手去做，在做中学习。这实在是初学史学的基本功。先师在课堂上说：“有人读了一辈子书，但并未入门”，当时听了，也不理解。现在想来，没入门的原因就在于缺乏这基本功。凡在辅仁历史系听过先师的课的学生都接受过这个基本功的训练。那时先师给本科生开一门课，名“史源学实习”，读的书是《二十二史札记》，方法和研究生一样，也是查出处。是不是受过这基本功训练的都入门了呢？恐怕不一定。这基本功不是听过课，查过书，就算毕业，而是要一直干下去的。建国以来，在大学历史系里有几个学生受过这样基本功的训练呢？现今学生往往高谈理论，鄙夷考证工作为不足道，写出文章，空话连篇，或东抄西抄，错误百出，他们的水平能提高吗？下面谈谈我的几点心得。

（一）搞历史研究，必须有丰富的史料，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史料是不是不加区别，多多益善呢？我看不行，特别是在先秦史方面。

由于史料太少，学者往往贪多求博，见书就抄，于是神话、传说

与历史相混淆，把后人伪造的古史系统当作经典看待，写文章彼此矛盾，时代颠倒，令读者目眩。我的办法是首先把神话、传说、历史分为三类，尽力把他们分开，神话当作神话来研究，传说当作未经证实的史料，只可备一说，留待有更多真实的材料加以证实之后，才看作历史。历史则是有根有据的可作真实的史实看的。其次是对史料经过研究，把它分成三等：上等的是当时人、当事人的记录或言论，如《尚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多方》《多士》等；次等的是虽非当时人、当事人的作品，但时代不太晚，比较可信的如《盘庚》三篇，《牧誓》《金縢》的第一段；下等的是后人述古史，由于时代太晚，问题比较多，使用时要特别慎重，如《尚书》中的虞夏书皆属此类。另外还要注意，真书中有伪，伪书中有真，都要区别对待。史料经过这样分类分等处理之后，再来使用，庶几无大过。上面所说，只是一般原则性的话，下面举一二例子来说明问题。

讲古代史从何讲起？传统的讲法是从三皇五帝讲起。三皇、五帝是什么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令人不知所从。《尚书》从尧舜讲起，《左传》里出现黄帝，《易系辞》出现伏羲，这说明时代越晚，出现的古帝王越古。司马迁作《史记》，断自黄帝，是很有见识的。就拿伏羲来说，本无其人，后人编造古史，把它人格化。例如《水经注》渭水篇：“故渼东迺成纪县，故帝太皞庖羲所生之处也，汉代以为天水县。”庖羲即伏羲，古音伏读如庖，后人于天水县建伏羲庙，一若真有其人。于是产生伏羲为夏族始祖，为羌族始祖，为彝族始祖等等说法，都是捕风捉影。太皞本东方部落首领，魏晋间人编造古史，竟造出“太皞伏羲氏”来，又因伏羲始作八卦，于是河南淮阳县竟出现伏羲画卦台。有人据《左传》昭十七年有“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的话，就说伏羲以龙为图腾，今天盛传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可能是从这里张冠李戴而生的吧。近来这种神话越传越离奇了。有人据《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纬含神雾》“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戏”（即伏羲），考证“胥”“疋”“雅”“夏”古音同字通，华胥即是华夏。华夏之名起于华山，据说这华山不是西岳华山，而是江苏太湖之滨的惠山，惠山古又称华山，雷泽是震泽之误。又据《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

雷神，龙身而人头……在吴西”。有人考出，雷泽就是震泽，即今太湖，“在吴西”，当然应解为在今苏州之西。经过这一番“考证”，伏羲竟出生在今江苏太湖附近，并且推出，伏羲氏后人逐渐繁衍分化，一支南行，就成为后世东南各族，苗、瑶、壮等之祖；一支北行，发展为炎黄夷夏诸族。原来我国古代各族都发源于太湖之滨，这真是一个绝大“发明”，可惜伏羲原是神话中的神，并非真有其人，这番“考证”全属子虚乌有，不能用以讲中华民族的起源。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考证古史对史料的使用必须慎重，不能见书就抄。首先要对史料的年代、性质、真伪等等进行甄别，严加区分，不能乱用。如《诗纬含神雾》是西汉末出现的纬书之一。纬书是汉人伪造的，和经书相抗衡的，书里所述多是神话，而不是历史。如华胥履大人迹而生伏羲的神话，明明是模仿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的神话编造的，这样的东西怎能当作根据来作考证文章？

我在先秦史的研究中，对于史料的鉴别和使用是非常慎重的。最初，在励耘书屋中受到援庵师的启发指导，才懂得这个道理。我在十年前写的《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①一文中已谈过，不再重复。后来读了梁启超的《古书的真伪及其年代》、崔述的《考信录》和顾颉刚的《古史辨》，逐渐加深了对古书的认识。但我不能算是疑古派。我相信荀子的话：“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详言之，就是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目的都在于求信，就是尽可能得到历史的真实情况。过去学者讲历史，把神话、传说与历史杂糅在一起，令人不知所从。司马迁作《史记》从五帝讲起，司马贞偏要补上《三皇本纪》，真是画蛇添足。崔述和顾颉刚先后对伪史作了摧陷廓清的工作，其功不可没，但疑古过了头，就产生反作用，达不到荀子所说求信的目的。

（二）搜求、鉴别史料是作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考证工作，这里问题就更多了。

也许有人会这样想：写历史书或讲历史课，史书上怎样记载，我们照写照讲就完事大吉，何必搞考证，岂不是自找麻烦？这种想法是

^① 见《励耘书屋问学记》。